

如坐春風五十年

王 道

——永懷 王世杰校長

民國七十年四月廿一日下午，朱士烈伯剛兄告訴我前總統府秘書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杰經公逝世了，我默然不言者久之。

第二天的清晨我到台北市仁愛路雪公官舍的遺像前敬禮後，愴然地離開。從聽到那個不幸的消息時候起，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觸與依念，也無時無刻不憶懷於這半個世紀以來，雪公對於我們這個飽經憂患的國家所作的貢獻，以及在這個漫長的歲月中雪公對我的教誨、鼓勵甚至影響我生命歷程的重大啓示與扶助。

珞珈山上武漢大學

記得我十八歲時考入武漢大學，校舍尚在武昌東廠口，那時雪公校長的春秋不過三十九歲。他穩重而緩慢有力的談吐，穩健而持重的步履，這五十年來無時不活在吐的記憶之中。

半個世紀匆匆的過去了。雪公校長在我們的國家正當最危難的時候，已盡了他最大心力，含

笑而去。對雪公個人而言，真是公忠體國，俯仰無愧，對我這個學生而言，有許多事是值得追憶的。

武大校友以及到過珞珈山武大校園的人們，莫不津津樂道珞珈山的校園是如何壯麗莊嚴，山明水秀，佈局宏偉。

試問：現在尚有幾人能回憶當時王校長雪公建校氣魄的遠大，以及其辛勤締造這個校園的艱難？美奐美侖獅子山上文法學院、圖書館以及天地元黃四齋的學生宿舍，誰知道那時是一片墳場？又誰知道在當時遷移這一片墳場所受的阻力之大？今日又有誰知道那時排除萬難，堅定奮鬥以底於成的那一段艱苦歷程？

記得當時校長雪公聘請美國著名建築師凱耳斯到達我國，配合校長雪公的構想完成我國這樣雄偉完整的學府，在設計時凱氏每天都佇立在荒蕪草莽的獅子山頭與珞珈山上，或徘徊在東湖之濱，經常達四五小時之久，冥思這未來學府的形象與佈局。

當定稿時，凱耳斯鑒選了這一筆艱勞，因為他認為在他的手上設計完成了這樣偉大的大學校園，已是對人類文化做了一件大事。

那時的武大除了巍巍雄偉的校園以外，所聘的教授多是當時傾彥，諸如周鯨生、陳西滢、王星拱、邵逸周、楊端六、郭斌佳、李惟果諸位先生，以及現在臺灣碩果僅存的李國鼎先生、高潮先生與蘇雪林老師等都是時之選。那時國內大學的師資能與武大相比者祇有北大、清華與交通大學而已。

雪公校長在那個時代，在那樣的春秋，能夠有那樣廣闊偉大的襟懷與毅力來創建這樣的一所學府，五十年後，回想起來，能不油然而生最高的崇敬之意！

南京請願往事樂迴

正當武大由東廠口將遷珞珈山的時候，抗日思潮，瀰漫全國。民國二十年，全國各大學正如風起雲湧般的籲請政府即時與兵抗日，學潮澎湃

，震盪全國。記得一天夜晚，同學們在東廠口校門前集會的情緒已達高潮，甚至不能抑止，真是亂哄哄的一片，如無政府狀態。適時校長雪公趕到，以其落實的態度，穩重肯定而充滿希望的訓誡，不十分鐘，那場風波即戛然而息。

不久，同學代表，鼓輪東下，到南京晉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表達愛國赤誠。我也是當時到南京同學之一。到南京後，我們住中央大學。第二日我們到國府大禮堂，即蒙 蔣公召見訓話。記得那時 蔣公很誠懇的告訴同學們：當時國家的處境與其保衛國家的決心，以及對青年學生的期望。同學恭聆後無不感動。次日，即搭輪返回武漢。雪公領導之下，秩序井然，深獲 蔣公嘉許與全國輿論的好評。

學校由東廠口遷到珞珈山後，雪公不久就榮任教育部長，到南京去了。在此短短的一段時間中，使我值得回憶的有二件事。

其一：雪公在珞珈山的時光，同學們與他單獨談話的機會不多，我幸而有一個機會蒙他召見。以一個學生晉見校長，多少都有些緊張情怯，但他給與我的是平和而安祥。他的言辭非常簡短，字字落實，言簡意賅。我記得他最後的兩句話：「……好好的用功，你將來是有成就的。」這兩句非常平常的話確實給與了我無限的力量，與無限的鼓勵。可惜數十年來，歲月蹉跎，書劍落拓，尚未能報答期望於萬一也。

其二是：當第一次武大校慶在珞珈山飯廳上臨時禮堂舉行時，校長教授致辭辭辭過後，同學們慫恿我上臺去代同學講幾句話。我鼓着勇氣到臺上講了五分鐘的話，臺下報以掌聲幾達十次之多。記得我當時說道：「校長披荆斬棘，筆路藍縷，建立了這個舉國聞名的學府，這些事實如記在日記上，將來回憶時，應在這一段日記上用硃筆打上一串一串快樂的連圈。由校長與諸位老師的智慧與努力創造了這樣的屹立我國華中的學府，以培植國家俊秀，若干年後，看見你們的學生為國家建功立業時，我相信諸位老師一定在現在的這段日記上用硃筆再打上幾串快樂的連圈。同學們在這個山明水秀的校園中，勤修苦讀，若干年後，稍有所成時，我們對於這個校園寧靜自然的孕育與校長及老師對我們熏陶的這段美好時光所留下來的日記，一定會打上串一串的快樂連圈……」我相信這幾串快樂的連圈，必定長存在校長的生命史上以及我們的回憶之中。

辭行聆教生命轉向

抗日戰爭爆發後，我服務軍中，轉戰南北。民國卅二年，我由晉東南太岳山區突圍後經西安返鄂任第六戰區挺進軍第一縱隊司令時，戍守由長江宜昌以下，白螺磯以上的江北防區，只掩護守備江南的三個集團軍，担负拱衛陪都重慶的任務。民國卅一年、卅二年間，浴血抗戰，我部曾三度攻復郝穴，聲震大江南北校長雪公在重慶聞知，迭電致賀，我振奮無量。這一點小小貢獻，校長仍不憚煩的加以鼓勵，感戴何如！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我那時服務於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在南京協辦受降事宜。迄三十五年春，受降事宜將告一段落時，中

央推薦我返鄂擔任省府工作。那時雪公任外交部長，我到外交部辭行時，恰逢那時行政院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先生在座。當時，校長與蔣先生均異口同聲地鼓勵我說：現在戰爭過去了，與其回去做官，不如回去作一些社會事業，造福大眾，更有意義；同時王德芳兄亦鼓勵至再，片刻間我的生命的方向作了一個極大的改向。如是我解甲歸故里，就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武漢辦事處處長。我國戰後，復員工作百廢待舉，戰後的家園，真是荒涼一片。那時救總的規模，在上海是首屈一指，在武漢與鄂南屬於我的工作地帶，論規模言，應是第二了。因為雪公對於我的愛護與推薦，使我能有機會為國家為同胞做了一點事。

尚可告慰於校長的，就是校長雪公的家鄉湖北崇陽縣，我曾親自驅車往訪崇山峻嶺中的雪公的府第，也拜訪了雪公誕生的小屋。我更以「以工代賑」的方式將崇陽縣城外的一座被日軍飛機炸毀的大橋修復，據說那橋是管轄湘鄂贛交通動脈的一座戰略性的大橋，我現在還記得那橋的名字是「百子橋」。

現在也可以告慰於同學的，就是我以「以工代賑」的方式將起自武昌城到珞珈山，以及環校的約計五十餘公里殘破的公路修復了。凡是沒有到過珞珈山的校友們，由校園內外公路的長度就可了解武大校園規模之大了。如果雪公沒有給我這個機會，我何能為家鄉父老與母校服務？

貢獻荊蕀寫反攻論

民國卅八年，大陸逐漸沉淪，政府播遷來臺

。記得我去查見雪公時，雪公命我寫一點衛衛臺一灣的意見給他，我在匆促間寫了一篇意見書送呈鑑閱，供參考而已。後來，總裁 蔣公在高雄壽山召見四位將領，有所垂詢。俟問到我時，記得第一句就問我：「你最近寫了甚麼東西沒有？」這使我愕然！蔣公垂問再三，我報告十五分鐘後，蔣公連說：「寫下來，寫下來。」我後來因此寫成了「反攻論」一書，提出了我的軍事思想，做了進入國防會議的墊腳磚。後來才知道，我遞呈雪公的那篇衛衛臺灣的意見，已由雪公轉交陳副總統辭修先生，陳辭公在軍事會議提出，蔣公非常欣賞。因為 蔣公有了那一點較深印象，所以在召見時才頻頻垂詢。由此而鼓勵我寫成了反攻論一書，此乃雪公間接所賜。

蔣公復職後，雪公任總統府秘書長時，其間有一段時期我任職國防會議。辦公地點同在總統府第二樓，因之我經常有機會去親候請訓。那時，同學中有黎子玉兄與丁憲燕兄二位均在雪公處工作。近在咫尺，這個機會該是如何的寶貴。

老師一票嘉惠學生

民國四十六年後，我由國防會議調任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工作，這段時期，我與雪公接觸較少，但自民國六十年後，使我感覺到榮幸的莫過於我與雪公同在國民大會服務。每次國大憲研會外交委員會召集人選舉時，雪公如有空均親臨會場投我一票。其間更使我感動的莫過於民國六十五年中國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大會出席代表的選舉，國民大會約九百餘黨員中僅能選

出二十位代表出席全會。這是一件隆重的事。我曾寫了一封信給雪公，信中有幾句話是這樣的寫着：「……學生有幸與吾師同在國民大會工作，深感光耀！以一個六十歲以上的學生尚能有機會懇求八秩以上高齡的老師賞賜一票，不僅倍增光榮，亦國會佳話。」曾幾何時，在我有生之年，今後再無機會榮受吾師之一票矣。

記得上次國民大會年會時，雪公會出席會議。當雪師離開會場時，步履艱難，我與黎子玉學兄同去揹扶出門，登車而去，想不到那次一別竟成永訣。雪公別我們而去，其個人的豐功偉業與

學術貢獻，在歷史上已經留下輝煌的紀錄。對我個人而言，因雪公的逝世，使我的記憶又回復到了童年、少年、青年、和壯年以迄今日。這匆匆半個世紀中，雪公對於我的愛護，鼓勵，提掇，雖然現在我是了無所成，但是在我心目中的雪公；其形象，其楷模，其持重，其為政不多言，其臨事不苟同，其為國也以忠，其對元首也以誠，其立言也以謹，其影響我五十年來持身行事莫不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量。雪公校長現在雖然含笑而去，但是他的一切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也將活在這個世界上許多人的心中。



國民二十四年二月廿四日（右）陳誠與陳誠（前中）胡適（前左）等合影。